



【庙堂江湖】

经济学家没人会同意“免费午餐”，估计也不会同意有一个“免费教堂”。

外国的教堂是免费的吗

沈凌

网络上流传着一系列的“外国免费论”。比如外国的高速公路是免费的，中国是收费的；外国的医疗保健是免费的，中国是收费的；外国的教育是免费的，中国是收费的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些似是而非的文章到处流传，很让一些中国屌丝愤愤不平，觉得外国月亮不是更加圆，就是更加亮。

最近，有朋友转发了一篇文章说：外国的教堂也是免费的，中国的寺庙却都是高门票，有些寺庙据说还是上市公司的业务板块，于是，文章直接得出结论：“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，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。进教堂的是免费听布道，忏悔自己的灵魂，听劝导

与教诲；而进寺庙的则是花钱烧香求佛求签，寻求保佑，乞求平安、发财、升官、交好运。前者是灵魂的沟通与升华，净化心灵；后者则用金钱图谋更多的好处与利益。”

听上去西方人好高大上，中国人好矮矮穷。事实是这样的吗？

经济学家没人会同意“免费午餐”，估计也不会同意有一个“免费教堂”。

我在德国念书时，课余去过阿尔卡特公司打工。这是正规公司，所以他们也为我的一点点工资照章纳税，记得公司财务人员为我填写个人信息的时候特意问道：“您信仰基督教吗？”

——好奇啊，你一个电子公司的财务人员问宗教信仰问题作甚？要知道，一般来讲，德国人不太问别人的

政治态度，宗教信仰和收入年龄，这些被认为是个人隐私。

看我狐疑，他连忙解释：我们德国的税收中有一个“教堂税”，如果你不信教，那就不会扣除这个税。原来是这样！到这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科隆大教堂那巍峨雄伟的哥特式尖顶，原来都是纳税人缴税建起来的，虽然我进教堂并不需要买门票，但是教堂依旧不可能是一个免费的产品。无非是由广大信徒按照税收的形式供养了而已。同理，德国免费的高速公路也一样，不可能是真正免费的，无非是纳税人缴税供养而已。

由此看来，问题并不在于高大上的免费和矮矮穷的收费，而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收费？

德国这样的收费方式是全民（教堂是全教民）缴费，而中国的收费方式是使用者付费。每一个缴费方式都有它的历史原因，我才疏学浅，没有能力对宗教历史、政治制度、历史文化等等一一研究。只是从经济学角度看，对于德国这样全民信教的社会来讲，如果每个教堂门口设一个收费站，收费成本相当高，而且也不见得能够比全民征税多收多少钱。这和经济学上认为的马路为什么是公共产品道理是一样的。

但是中国不一样。中国人基本不信教，大部分人去寺庙，除了拍照片，就是像那篇文章讲的，“贿赂”菩萨得个很世俗的功名。所以，使用者付费的模式既能减轻真正教民的负担，还能

更加有效地征收建寺庙的费用。

其实在中国，你是真的佛教徒也是可以得到一张身份证卡，自由进出寺庙的。只不过该作者不是佛教徒，不知道而已。

其实是在德国，教堂门口往往很显眼地摆放着捐款箱。这和中国的寺庙也很类似。只不过该作者作为游客，或许只顾拍照片，没有注意到而已。

那么还是会有人问：教堂这样的收费方式不是有利于我们非教徒和游客吗？中国这样的收费方式不是在阻碍着我们参拜菩萨信仰佛教吗？从这个角度看，人家的确好大方，很上档次的嘛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值得再写一篇文章。容我这里卖个关子，休息一下。（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）



【念念有余】

失实的人口数据让土地供应量出现偏差，只能出现人为制造的紧缺状况。

高房价正铸造冷漠的钢铁丛林

余胜良

北上广深已成为超级城市，但却没有按照超级城市的标准规划，造成房价飞涨的恶果，症结难解。

当深圳房价每平方米2万元时，已有很多人直呼买不起，现在跳涨到5万元，却购销两旺，供不应求。深圳人收入高，深圳基础设施好，深圳产业发达，货币政策宽松等原因均可作解释，但都不是核心因素。

核心是土地供应量和政府在土地供应上的态度。

深圳市去年新增商品房用地仅10万平方米，去年总供应为85万平方米。土地市场总成交金额为417亿元，同比减少约4成，主要原因是土地出让数量（不含协议出让和旧改项目）较上年减少了3成。

一个居住1800多万人口的城市，去年新房成交套数只比惠州下面的大亚湾高50%，要知道大亚湾只有几十万人人口，还不如深圳的一个零头。北京也存在类似问题。

这也难怪一线城市土地价格会大涨。据易居研究院最新数据，2015年12月，一线城市土地成交均价为10436元/平方米，同比上涨46.8%。今年前几个月，北京房地产商拼命抢地，5环外楼面地价也上了3万元/平米。

与此同时，流入人口还在增加，2015年广州、深圳常住人口比上年分别净增42.06万人和59.98万人，共占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92.02%。

深圳去年新房成交6.6万多套，以每套住三人计算，新增安置不到20万人，这意味着还有近40万人的住房缺口。新房供应不足导致二手房成交

激增，2015年深圳二手房成交12.7万套，增幅超过一倍。北京今年前两个月二手房交易也翻倍。

一套房子几个人买，价格只可能高到其他人买不起为止。稀缺商品价格什么时候会下降呢？

有人认为土地供应减少是政府为了避免大城市病。既然行政手段不能奏效，只能利用高房价这种经济手段。

好像低收入者会被赶走，其实不然。北京地下室赶出的低收入者只是搬得更远，而非离开。往来数小时只为讨口饭吃。只要有工作机会，净收入比其他地方高几百元，他们就愿意忍受交通不便。

深圳密密麻麻的城中村帮了大忙，可容纳低成本劳动力，问题是深圳旧改正在消灭城中村，这当然也消灭了低价房。

高房价没让低收入者离开，却让普通人丧失容身之处。高房价正铸造一个个令人敬畏的钢铁森林。

北上深的地铁所到之处，无论多远都不能算偏。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经济体，有交通网络之处都可以盖起楼房，即使昔日田野中也可以住满人，成为高效城市的一部分。

大都市经济体崛起不可避免，就是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向都市转移也没有结束。既然无法避免，政府应做的是迎接超级城市的到来，提前做好规划，做好接纳新居民的准备，少走弯路。

办法看似简单，只要增加土地供应即可，但这些城市经常会称“无地可用”，这又和观感不同。一线城市周围还有很多空地，北京到处是开闢之处，土地使用效率还可以有很大提升。

问题就在于土地规划，政府投入

土地是根据人口来的。可笑的是，深圳这样的城市，户籍人口只有400万，常住人口为1000万，其实都知道这里人口有两千万之多。北京、上海的人口应该也被低估了。

失实的人口数据让土地供应量出现偏差，只能出现人为制造的紧缺状况。

还有一种观点是保护耕地，城市建设占用耕地有错吗？伴随城市化，中国被村庄占去的耕地还会被释放出来。现在中国粮食供给一直充足，政府还在考虑去产能，即使紧缺，由于一线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更高，耕地也应通过其他区域置换而来。

不顾现实、掩耳盗铃的城市规划方法，已经让中国的一线城市越来越脱离普通人，即使现在改，改正的空间也已不大。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

【口舌之勇】

建立传媒业知识产权保护生态圈的最目的，是为了捍卫内容生产者应有的尊严与利益，让传媒业的专业精神不死。

从曹林打赌再谈知识产权保护

孙勇

近日，腾讯网总编辑王永治在访谈中预言报纸将在2018年前死去，多数媒体人将在2017到2018年下岗。中青报知名评论员曹林随后撰文称，他本人愿意和王永治打个赌：到了2018年底，如果这个预言实现了，他直接从报社辞职；如果这个预言没实现，王永治从腾讯辞职。

对于曹林摆下的这个赌局，王永治并未接招。尽管如此，这个单向度的虚设赌局，还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，尤其是在新闻从业界。

毫无疑问，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，报纸已经成为夕阳产业，无论是从便捷性还是从环保的角度看，它都比不上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。传

统媒体被新媒体彻底取代，是早晚的事；围绕着那个完成取代的具体时间窗口打赌，其实意义不大。当然，这次打赌再度引发了各方对于新闻业态变化的热议，算是好事。

遗憾的是，针对这次打赌事件的纷纭讨论，目前还未上升到最有价值的层面：如何保护知识产权。

表面上看，眼下新媒体比传统媒体热闹。但细究起来，多数新媒体也是只赚吆喝不赚钱；那些极少数赚钱的新媒体，以原创内容打天下的也并不多，很多都是巧妙地扮演了文抄公的角色而已。不客气地讲，中国传媒业就是一个盛行海盗文化与偷窃文化的江湖，知识产权实际上已经沦为被抛弃的牌坊。

如果把观察中国传媒业的时间维度拉长，可以看到：30年前，A报纸抄

袭B报纸，B报纸抄袭C报纸（美其名曰“转载”，实际上既不准确交代转载来源，也不真实刊登作者姓名；即便交代了转载来源与作者姓名，也往往不支付稿酬）；20年前，门户网站兴起，网络新贵们直接拷贝报纸文章成为家常便饭；10多年前，报纸们纷纷开办门户网站，这些网站也是你抄我来抄你；最近几年，自媒体兴起，更是将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的伎俩发挥到极致。如今，这几个阶段的抄袭现象并不是截然分割的，而是出现了各种抄袭方式相互交汇的超级抄抄抄。

“试看剃头者，人亦剃其头。”这么多年来，由于只是在口头上重视，而在行动上忽视知识产权保护，中国传媒业深受其害，个中充斥着捞一把就走的短期利益至上的猎食者，一个有利

于传媒业长期健康发展的生态圈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。

应该承认，时至今日，以报纸、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，仍是原创新闻的主要提供者。在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的混乱格局中，报纸是最大的受害方，虽然其本身也并非干净无瑕。要想传媒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真正落地，从利益的生发机制看，报纸界应该在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主导作用，因为那些乐于当“新闻搬运工”的新媒体在这方面暂时缺少真正的动力。从目前看，如果报纸界真的愿意有所作为于知识产权保护事业，最有可能成为报纸同盟军的，将是自媒体的大咖们，理由很简单：原创内容被无偿割窃，使得冲浪于新媒体大潮中的自媒体大咖们很受伤。

当然，传媒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，离不开整个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大气候的改良。于此，曹林也有很多文章可以写，报社的同仁们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温水煮青蛙的故事，报人们讲起来比谁都精通，但在传媒业知识产权保护形同虚设的温水中，绝大多数报纸都变成了青蛙。所幸水还没有完全煮开，奋力一跃还有机会。建立传媒业知识产权保护生态圈的最目的，不是挽救报纸等传统媒体（虽然它客观上能延长报纸的存活时间），而是为了涤荡恶臭的海盗文化与偷窃文化，捍卫内容生产者应有的尊严与利益，让传媒业的专业精神不死——这是传媒业生生不息的根基。不知曹林先生和王永治先生对此以为然否。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

【缘木求鱼】

单纯地宣传“理念”，就不如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帮扶措施，农民都富裕起来了，谁不愿意做城里人？

城里人的乡愁 乡下人也想

木木

“农民在城市购房是升值，在农村建房是贬值”。这是江西省有关部门日前要求广为宣传的一个理念。虽然“理念”一亮相，就引来叽叽喳喳的一片议论声，但只要静下心来细琢磨琢磨，这理念，也似乎并非一点道理没有。

一件东西，如果不打算或者根本就卖不出去和抵押，那么所谓“升值”或“贬值”的概念，原本还真没什么太大的现实意义。房子当然亦如此。

因此，单就出售或抵押等变现行为的可行性和便利性而言，城里的房子，无疑就是比农村里的房子更有价值。如果再考虑到日常生活款更便利的因素，附着在城里房子上的价值就更不得了，而且，往往城市越大，附着在房子身上的价值就越高。对这种“价

值”的认识，其实老百姓心里的小算盘都被弄得清清楚楚，原本是用不着让谁来教的，人们都争着往城里、往大城市跑，即是明证。

人们竞相追逐更高价值的必然结果，自然就是农村里一日甚于一日地冷清起来。这几年，城里人流行“乡愁”；只要一犯了“乡愁”，似乎马上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不过，如果真让他们赶紧回去去“治病”，大约又很少有人能铁了心地跑回去。何也？无他，城里的生活总归要比农村方便、舒适得多。因此，城里人的所谓“乡愁”，多多少少都带了些许矫情的味道，其实，乡下人的“乡愁”才是真正的愁。

大约，没什么人能否定得了，人口是支撑房价的一个最重要因素。人都跑光了，村子里的房子还有个屁价值？即使还剩下一些“老弱妇孺”，整日眼

巴巴地盼着被远方拴了的子女、男人、父母能回家团聚一次，他们那被日子熬得羸弱不堪的肩膀，估计也实在扛不住小村子里的房价。其实，也实在没有“扛”的必要，家家户户都很有那么几间房，自家的都扛不住，哪还顾得上替别人扛。

村里人的房子，只能村里人买，城里人是没有买的资格的。有了如此的死规矩，即使有几个城里的“陶渊明”铁了心地想跑回乡下去，也没有现身可能性；哪怕“陶渊明”心里的乡愁都咕咕咕地往外冒，大约也只能干瞪着眼儿日复一日地“愁”下去。

前两年，到处都嚷嚷着“新农村建设”，但人口只出不入，依靠那些“老弱妇孺”来搞“建设”，总归有点儿不靠谱，而且，“建设”了半天，又准备让谁来享受最后的成果呢？农村没有人，别

说“建设”没法儿搞，连老房子也不可能有价值——保值都成问题，还总梦想着能升值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

大约，也实在是有点儿禁不住细琢磨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四处嚷嚷着“新农村建设的”就明显见少。现在，江西省的有关部门把这真相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，无论如何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吧；而且，别管其出发点何在，哪怕就算是为了自家辖区内的房地产“去库存”，单就阻止农民别在村儿里白瞎钱而言，人家就真不失一片古道热肠之风。

因此，依本人看，江西省有关部门希望昭告省内民众的新“理念”，还真不是胡扯八道。不过，这年头儿，似乎谁都不容易，领导们就更不例外，虽然抱定了为民指出明路的初心，但仍免不了有人有意见，所以，江西官员甫一开口，立即讥嘲之声遍野，实在不奇怪。现在是开明盛世，不好堵人家的嘴，哪怕有些人讥嘲得实在没道理。但嘴不好堵，也不意味着只能无所作为，不妨从自身再找找问题，看是不是确实还有地方没考虑得更周到。

比如，宣传“农民在城市购房是升值，在农村建房是贬值”的理念，目的无非是希望农民别再倾全家之力在村子里盖房了，最好都去城里买房。但现实是，那些有能力在城里买房的，早就忍不住跑去买了，直到现在还没买的，大约就真是买不起。要让这些人最终都能买得起城里的房子，恐怕单纯地宣传什么“理念”，就不如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帮扶措施，农民都富裕起来了，谁不愿意做城里人？即使城里人免不了“乡愁”的骚扰。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